

论清末非洲华侨的社区生活

李安山

与移民东南亚等地的华侨相比，非洲华侨的历史要晚得多。虽然在16世纪末即有华人来到南非，但真正形成华人移民社区则是在清末。本文将叙述清朝末年华侨在非洲各地的创业过程及他们的社区生活，并力图在综合的基础上分析早期华人社区活动的特点。

一 非洲华侨的自由移民

在学术界普遍存在着一种看法，即认为非洲华侨的前辈是来此做工的契约华工。不容否认，契约劳工确实在数量上占当时非洲华侨的绝大多数。然而，他们中很多或葬身于苦工场所，或契约期满后返回中国。这样，真正构成非洲华侨社区主体的是那些自由移民。所谓“自由移民”，包括早期从巴达维亚流放至开普刑期已满的犯人及其后代、直接从亚洲迁移过来的华人和契约期满后仍然留下来的华人。

最早来到非洲的中国人很可能是被荷兰殖民当局从东南亚地区运来的囚犯。1638年5月，第一名荷兰总督古耶尔(C. S. Gooyer)带了25人，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驻扎于毛里求斯。当年又有两艘船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运来了一些人，使岛上的人员达到80人，他们大部分是囚犯。

这些人中间很可能有华人。1652年在桌湾登陆并建立开普殖民地的范·里贝克曾数次要求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东南亚派中国劳工来南非，但一直没有成功。1654年荷兰殖民者将3名中国人从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运到毛里求斯，这是有案可查的抵达非洲的第一批移民。在1660年，一个名叫万寿(Wancho)的中国囚犯被从巴达维亚运到开普。此后不断有中国人被作为罪犯从巴达维亚送到开普。然而，在18世纪初已经出现了自由移民。1702年，一位名叫亚伯拉罕·德维夫的华人在开普被接纳入新教教会并受洗礼。在1722年，开普的一些中国人和自由黑人组成了类似民兵自卫队的组织，作为应急之用。这些早期自由移民很可能是刑期已满的华人囚犯。

当时巴达维亚的荷兰殖民者十分担心当地华侨的竞争，便制定了各种限制华侨的政策和措施。这种政策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当地华侨的反抗，最后终于导致了1740年的“红溪事件”。参加起义的华侨被大批杀害，有些则被流放到开普殖民地。在18世纪，一些在南非服刑期满的华人在当地留了下来，他们先是构成了在东印度公司时期被称为“自由黑人”的一部分，后来又成了所谓“有色人”的一部分。到19世纪初，英国政府为了

29 笔者以为，目前得到有关学者认同的“因青田石行銷欧美而诱发了青田温州的移民潮”之说，就“传说”的传奇意义（而不是史实性）而言，是可取的；但本世纪初“青田出人流显然都是以推销石制品为业”之说，笔者则难以苟同。

30 参阅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省政协文

史资料委员会编：《东瀛沉冤——日本关东大地震惨杀华工案》，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31 据台湾驻西欧有关代表机构在50年代初所做的统计，当时西欧各国华人总数为11980人。参阅徐斌，前引书，第2—3页。

开发南非，要求驻广州的英国代表协助从中国引进移民。

据记载，在 1815 年，一些中国木匠和泥瓦匠乘坐英国皇家海军的船只来到南非，并帮助修建了位于西蒙斯敦造船厂附近的基督教堂。1894 年，又有华人厨师、花匠和木匠乘“诺福克号”来到南非作工。1834 年圣赫勒拿岛成为英国皇家殖民地，岛上很大一部分华工也被送到开普殖民地，他们中有的继续做劳工。除了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不断有华人迁移到南非外，一些华人也从附近岛屿

来到此地。这些人有的是自己作为苦力到南非来寻找工作的，有的则是一些当地的欧洲移民非法走私进来的，还有些则是由开普殖民地政府和纳塔尔殖民地政府专门引进的。根据当时的记载，一些移入的华人工匠参加了德班港的建设。在 1880 年，甚至有南非华人专程到毛里求斯，劝说那里的华人移居南非，但效果不大。与此同时，一些新移民参与了当地的工程建设。如有些华人移民即参加了在 1875 年开始的德班港的修建。

表 1 南非华人统计表 (1720 年代—1880 年代)

年份	抵达 或居住	人数	身份	地点
1725	居住	2	自由黑人	开普殖民地
1743	居住	38	刑满囚犯	开普殖民地
1750	居住	16	自由黑人	开普殖民地
1760	居住	14	自由华人*	开普殖民地
1770	居住	5	自由华人*	开普殖民地
1774	居住	3	自由华人*	开普殖民地
1775	居住	3	自由黑人	开普殖民地
1814	抵达	23	劳工 (私人雇用)	开普殖民地
1815	抵达	25	劳工 (政府雇用)	开普殖民地
1849/1/12	抵达	不详	劳工	伊丽莎白港
1875/8/16	抵达	75	劳工 (政府雇用)	纳塔尔殖民地
1876/1	居住	53	劳工 (政府雇用)	彼得马里茨堡
1881/11/10	抵达	18	劳工	伊丽莎白港
1881/12	抵达	不详	劳工	伊丽莎白港
1882	抵达	126	劳工	纳塔尔殖民地

资料来源: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pp. 5- 24; 詹姆斯·C·阿姆斯特朗:《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的华人 (1652—1795)》, 转引自方积根编: 前引书, 页 35。

* “自由华人”数引自阿姆斯特朗的著作, 与自由黑人均均为服刑期满的华人。

不过, 华人移民到南非的高潮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这主要归结于三个因素: 金矿的发现、毛里求斯移民政策的改变和南非与葡属东非铁路的接轨。

当时在南非已先后发现钻石矿和金矿,

这对那些处境艰难的中国人是很有吸引力的。他们中有在清朝统治下已无路可走的沿海一带的农民, 被作为劳动力招募; 有的人的亲戚已在非洲定居, 他们是为投亲靠友找一条生路而来; 还有的则是附近岛屿或非洲

其他地区的中国人，他们对“黄金梦”充满希望。第二，毛里求斯的殖民地政府于1877年取消外国移民入境须事先经过批准的规定，大批华人移民迁入。1871年毛里求斯的华人为2284人，1881年达到3549人。一些难于找到工作的华人只好迁移到南非来淘金。

表2 南非华人人数统计表（1904年）

居住地	男性	女性	合计
开普敦	1366	14	1380
纳塔尔	161	4	165
德兰士瓦	907	5	912
总计	2434	23	2457

资料来源: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p. 177.

第三，1897年，德兰士瓦与葡属东非铁路接轨，一些邻近地区的华人从德拉果阿湾进入德兰士瓦。李卓凡认为，在1888-1898年间，约有1800人移入德兰士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从毛里求斯、留尼汪和葡属东非等地移民而来的。1896-1898两年间，即有1200多华人从毛里求斯乘船抵达南非的伊丽莎白港。当然，这些人并非全部作为自由移民；有些人可能作为契约劳工迁入。到1904年，南非的华人已有2000多人，到1911年，华人的数目反而有所减少。南非的华人大部分来自广东省，又分为广府人和客家人。前者主要来自南海、顺德两地附近的村镇，后者主要来自梅县一带。¹⁰

表3 南非华人人数统计表（1911年）

居住地	男性	女性	合计
开普敦	804	19	923
纳塔尔	161	11	172
德兰士瓦	905	5	910
总计	1870	35	1905

资料来源: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p. 177.

最早到毛里求斯的华人是何时抵达的仍然不得而知。在1750年，曾有人在毛里求斯的一块岩石上发现了一些中国人的名字。到了1761年4月20日，毛里求斯的户口登记簿上已有两名澳门籍华人的名字。在18世纪末，中国和毛里求斯岛之间的贸易非常重要，毛里求斯向中国出口乌木木材，而从中国输入食具、瓷器、丝织品和竹制家具。¹¹一个名叫米尔伯特的随军绘图员在1801-1804年间住在毛里求斯。他写道：“我觉得我在法兰西岛上所遇到的中国人是持重的。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不大接触奴隶，而愿意与白人公司打交道。他们在咖啡馆，叨着烟袋，度过闲暇。他们性情温顺，沉闷寡言。”¹²

毛岛第一任总督法夸尔是鼓励移民的。他曾就稳定中国移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人刚刚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上，全然不知所措。所以，在一段时间里，政府对他们予以一定的保护，以便使那些返回中国的人能现身说法，影响更多的人移住这个国家。”他在东南亚的殖民经验使他充分认识到华人在开发殖民地过程中的重要性。为此，他提出了一些稳定华人移民的措施，其中包括制定适用于华人移民的法律，“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让中国人走掉，我们是中国移民的主要既得利益者。”¹³

1817年，一个途经毛里求斯的人曾饶有兴趣地提到：当时路易港已有“一个不很大的由黄种人居住的、被称为中国村的居民区”。¹⁴当地的华人领袖陆才新已经在此建立了自己的商店。为了进一步开拓自己的事业，为家乡的亲朋戚友找一条生路，他决定到中国去招人。1821年，他得到了毛岛总督的特许证到中国去募工，并于1826年12月3日带回5名中国人，他们的名字为黄宝(W hampoo)、韩凯(Hankee)、恩格银(N ghien)、哈克金(Hakhim)和阿兴(A hin)。从19世纪30年代起，移居毛里求斯的华人开始增加。¹⁵

表4 中国自由移民毛里求斯人数统计表
(1833—1846年)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1833	8	1842	44
1834	5	1843	49
1837	10	1844	64
1838	12	1845	45
1839	28	1846	58
1840	59	总计	441
1841	59		

资料来源: 李卓凡:《西印度洋华侨史》, 转引自方积根编: 前引书, 页 154。

从上表看, 在不到 15 年的时间里, 有 441 名华人移居毛里求斯, 其中尚缺 1835 和 1836 年的统计数字 (也有可能这两年没有华人移入)。如果加上原来已在这里的华人 (包括契约已满的但仍愿意留下来的华工), 应该将近 600 人。1853 年, 一位英国人在毛里求斯的首府发现不少华人, 他们中有的做苦力, 有的做橱柜。¹⁶ 在 1857 年以前的几年里, 有 202 名在留尼汪契约已满的华工移民到了毛岛。¹⁷ 1859 年, 广东梅县客家人陈廷植偕夫人洪氏 (福建人) 由新加坡抵毛里求斯。¹⁸

表5 毛里求斯华人口统计表 (1850-1911年)

年份	男性	女性	总计
1850	586		586
1851	1086		1086
1861	1550	2	1552
1871	2284	3	2287
1881	3549	9	3558
1891	3142	9	3151
1901	3459	58	3517
1911	3313	355	3668

资料来源: 李卓凡:《西印度洋华侨史》, 转引自方积根编: 前引书, 第 51、114、160 页;《新商报》(毛里求斯), 1958 年 8 月 14 日。

在 1860 年代出现了华人移民毛里求斯

的第一次高潮。这主要有两个因素: 第一,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和随后被镇压, 中国南部出现了大混乱。大批难民涌向海外; 第二, 从 1860 年起, 移民海外已经合法化。实际上, 早从 1859 年起, 广州地方官员就发布公告, 允许外国人招募契约华工。仅 1860 年一年, 抵达毛里求斯的华人即达到 379 人。¹⁹ 清末是华人流向海外的高潮期, 到非洲的华人也呈上升趋势。他们往往首先在毛里求斯上岸, 再从这里移向其他地区。从上表看, 1860 年代以后的华人人数增长很快。值得注意的是, 1891 年的华人数比 1881 年的少 400 多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比较合乎逻辑的解释是, 一些华人在毛里求斯登岸后, 又迁移到了邻近岛屿或已发现金矿的南非德兰士瓦。

留尼汪的首批华人作为苦力于 1844 年 4 月 13 日来到此岛的, 一共 54 人。

他们抵达后不久, 便被人贩子梅洛和夏布里埃按每人 450 法郎的价格卖掉了。到 1846 年 7 月, 留尼汪岛已有中国苦力 458 名。到 1848 年, 岛上已有华人 728 名, 到 1862 年只剩下 415 名, 据同时代人说, 这些人几乎全是商人。1857 年一位名叫陈璋满的福建人在留尼汪开设了一家商店。一个名叫李天伯的商人于 1885 年抵达留尼汪, 他是第一位抵达留尼汪的客家人。在后来的日子里, 有的移居到了马达加斯加或南非, 同时又来了一些新移民。²⁰

在非洲早期华人移民中, 刘文波 (法文名为 Maurice Akwon Lawson²¹) 先生可以算是佼佼者。他于 1872 年生于广东顺德, 其父早年来到毛里求斯。刘文波于光绪 13 年 (1887 年) 来到毛里求斯, 并在极短时间内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他的语言天赋被当地侨领亚方·唐文看中, 收他为谊子。刘文波生性聪明好学, 在唐文的悉心指导下, 他经营商业有条不紊, 生意发展迅速。在毛里求斯生活了一段时间后, 他得知留尼汪资源丰富, 便

向亚方·唐文建议向该岛发展商业。这一建议得到了唐文的赏识，他拨出一笔资金来支持刘文波到留尼汪去开设商行。1901年，刘文波到达留尼汪，在圣丹尼首创华侨资本的贸易行，取名为广刘信号。他从此在留尼汪独当一面，主持广刘信号的业务。经营了四五年后，广刘信号的基础建立了，商业拓展了。²² 随后，不断有华人从毛里求斯来到留尼汪。

表6 留尼汪岛华人移民入口统计表

年度	华人移民入口数	移民入口总计
1858	451	60800
1862	413	72377
1877	654	67048
1880	608	64411
1881	518	46822
1892	412	37469
1901	1026	23326
1907	810	12879

资料来源：何静之：《留尼汪岛华侨志》，第19-20页。

表7 留尼汪华人人数量统计表（1848-1911年）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1848	728	1859	436	1878	637
1849	644	1860	420	1879	620
1850	562	1861	417	1880	618
1851	522	1862	415	1881	532
1852	503	1864	977	1887	537
1853	475	1866	1123	1892	412
1854	460	1871	1179	1897	547
1855	448	1872	935	1902	1378
1856	445	1873	792	1907	810
1857	451	1875	707	1911	884
1858	445	1876	688		

资料来源：Edith Wong-Hee-Kam, *La Diaspora Chinoise aux Mascareignes: Le Cas de la Reunion*, p.

最早出现在马达加斯加的华人应该都是从毛里求斯和留尼汪迁居过去的。²³ 这两个岛不仅早已有华人居住，而且和中国的贸易活动也相当重要。从这两个小岛向马达加斯加迁移是十分自然的。首先是这两个小岛从距离上离中国更近，华人移民非洲大多先在此（特别是毛里求斯）登陆。其次，马达加斯加的面积要大得多，对华人更有吸引力。关于华人最早出现在马达加斯加的书面记录似乎是在1862年。²⁴ 英国传教士埃利斯在这一年的5月访问塔马塔夫时，发现了一家华人经营的杂货铺。这一线索说明了两个问题：华人最迟于19世纪50年代已在马达加斯加出现；华人在此已有自己的产业。1866年，马岛已有6名华人。²⁵

然而，马达加斯加华人有自己的说法。1939年，非洲侨领陈静波奉中华民国政府之命，对非洲华侨进行巡视。他在马达加斯加采访时，当时已到马岛56年的老华侨岑惠如先生口述其所见所闻。这一采访报告对了解马岛华人的历史很有帮助。华侨中流传马达加斯加的华人开山祖是陈敖，广东顺德人。他原来定居在毛里求斯，以捕鱼和打捞海货为生。后来在打捞海参时发现马达加斯加地广人稀，便与乡人一起迁入。与他同时迁居塔马塔夫的还有其同乡陈汝璇、陈足、陈能等三四人，其年代已不可考。²⁶

马岛华人富商陈广明（广东顺德人）先辈早在毛里求斯经商，陈广明迁往留尼汪并开设了远发隆商号。后因在乘船视察邻岛分店时遇风暴漂至马达加斯加，便在塔马塔夫开设广利荣商号。法国殖民军1883年曾命令他为法军准备军需物质，这表明他的商店当时已很有规模。法军占领马达加斯加后，陈广明因为法军供应军需有功，被法军授予四星军衔。他到晚年返回中国，广利荣商号交给其族弟陈秋（字礼堂）经营，仍保留四星军衔。1886年，15名毛里求斯华商抵达马达加斯加的塔马塔夫。法国殖民政府在19世纪

末和 20 世纪初招募的华工也有一些留居此地，有姓名可考的如广东梅县人吴德、邓祥等。

最早抵达马达加斯加北部迭戈地区的先是契约华工，后来福建人魏顺发等人迁居此地，以种瓜菜为生。1890 年至 1892 年间，广东顺德人邓敬修、陈明金、梁文瑞、何兆等从塔马塔夫迁来经营商业，另外一些华人从事种植买卖咖啡、华尼拉（一种香草）为生。此外，南部菲亚纳南楚阿的嘉应人郭亚富、番禺人麦金等，以及塔那那利佛的顺德人霍森、岑尚省、梁旋、黎某以及后至者关信、关长、关棠、霍琛、霍盈、岑义腾、岑棠梁秋等，均为马达加斯加华人的先辈。这些人多为法国对马达加斯加的占领完成以后从毛里求斯和留尼汪迁移而来，其数量明显增加。

在葡属东非（即莫桑比克），华人在 19 世纪后期即已开始移居洛伦索-马贵斯。早期华人绝大多数来自澳门。他们的移民，既非政

表 8 马达加斯加华人移民人数统计表
(1862- 1910 年)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1862	1	1903	284
1866	6	1904	452
1893	40	1905	460
1896	190*	1905	463
1897	195*	1909	512
1899	62	1910	540

资料来源: Hubert Deschamps, *Histoire de Madagascar*, Paris: Editions Berger-Levrault, 1961, p. 216, 253, 299; Slaweki, *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in Madagascar*, pp. 43- 49; 李卓凡:《西印度洋华侨史》，转引自方积根编：前引书，第 221 页。

* 可能将在马达加斯加做苦工的第一批契约华工中的一部分也计算在内。

治的关系（为政府所不容），亦非经济的原因

（谋生的艰难），而是被澳门政府充军至此。30 年代还健在的被流放的两位华人曾揭露：在充军期内，作苦工，辟山地，斩榛棘，每每因气候的恶劣，病死者时有。到期限满后，则放之。任其自生自灭，政府绝无怜悯而设法安置。所有充军者，全凭借个人的生活能力，挣扎奋斗。当时的洛伦索-马贵斯荒无人烟，全凭坚忍不拔的华侨将这块不毛之地开辟并使之繁荣。²⁷

后来又有一些来自广东省的工匠。第一批移民是 19 世纪最后二三十年来的，他们大部分在洛伦索-马贵斯定居。1903 年，这些先驱者中一位名叫贾阿桑（Ja Assam）的木匠兼建筑师将自己的一块地捐献给洛伦索-马贵斯的华人，以修建一座“中国亭”。一个社区协会后来在此城建立了一所中文学校。1893 年，在洛伦索-马贵斯有 52 名华人，1900 年，此地有 84 名华人。而到 1903 年已增至 287 人。除了独立的工匠外，有的华人为曼尼卡-艾-索法拉的蔗糖公司和采矿公司干活。还有的华人为 1892- 1898 年间修建的贝拉——乌姆塔里（津巴布韦）铁路和 1886- 1894 年间修建的洛伦索-马贵斯——科马蒂普特（南非）铁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²⁸

此外，在非洲的其他地区也有少数华人。如塞舌尔的华人，有的来自香港，有的来自广州，而更多的则来自西印度洋群岛，特别是毛里求斯。1898 年，一个叫罗山（Low Shang）的华人是这样填写他的入籍申请表的：“商人，买主，在安斯·博楼地区加工和种植华尼拉。33 岁，中国人，出生广州。配偶雅如佳，中国人，家住香港。罗山原系广州缫丝工人，1893 年 12 月 25 日抱着经商目的来到塞舌尔。来塞后一直经商，并加工和种植华尼拉。在塞无任何财产，意欲在塞居住若干年。希望加入塞国国籍，打算在塞购置地产。”²⁹在罗帝利岛也有一些华人。最早到此定居的是以林伟为首的 4 名福建人，他

们于 1850 年左右从毛里求斯大岛迁到此岛。林伟尝试着开设店铺，其余几位则与当地人为伍，从事务农畜牧。1910 年前后，又有一批侨胞来到此地，他们艰苦创业，自建店铺，在此经营起小商业来。³⁰

表 9 塞舌尔华人发展情况 (1891- 1911 年)

年份	塞舌尔居民人数			华人居民人数		
	男性	女性	总数	男性	女性	总数
1891	8302	9138	17440	44	1	45
1901	9105	9432	18537	108	2	110
1911	11557	11134	22691			81

资料来源：“1948 年塞舌尔人口调查报告”，李卓凡：《西印度洋华侨史》，转引自方积根：前引书，第 169 页。

中国国内最早关于非洲华侨的统计数出现在 1907 年 4 月的《外交报》上，当时世界各地的华侨人数为 8954889 人，非洲华侨为 7000 人。³¹很明显，这只是一个估计数。

二 早期华人社区的经济活动

非洲早期华侨的社区活动主要为两项：经济活动和社团活动。除了新来的华人移民外，不论是契约期满的华工，还是从外地迁来的华人，绝大部分均将自己辛苦积蓄下来的钱办起了小商店，这种小规模的经营似乎已成为一种模式，在早期华人中十分普遍。

初到毛里求斯的华人，一般都是身无分文。他们唯一的谋生之道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当时毛里求斯的制糖业颇具规模，而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威胁着甘蔗种植园的发展。英国人于 1810 年接管毛里求斯后，第一任总督法夸尔一直鼓励引进外国劳工。从东南亚或中国移民毛岛的华人凭借坚忍不拔和吃苦耐劳的秉性，勤勤恳恳地在甘蔗种植园工作，得到了种植园主的赏识。他们认识到，华人是最肯干最值得依赖的劳工。经过几年的辛苦劳动，在种植园劳作的华人积蓄了一笔小小的资本，他们便在亲友同乡的支持下

开始经营零售业。

最早的华人首领，福建移民陆才新（亦称亚贤³²）即开办了一家公司，其规模介于大商店和小商店之间。他于 1826 年从中国带来的 5 名中国人成了“陆记公司”的雇员。他对这几个新移民进行训练后，让他们分管自己的分店，从而使业务大大扩展。1831 年，他又为一位叫阿冈的中国人提供了担保。从那时起直到 1847 年止，他始终是迁移到毛里求斯来的中国人的主要担保人。他将新来的移民安置在马拉巴尔移民聚居地，并尽量在全岛开设商店，将后来的新移民安置在他的商店里工作。他一直是华人中无可争议的首领，并于 1847 年被当地政府授予英国国籍。

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当地华人福利事业的亚方·唐文（A ffen Tank Wen，国内有人译作阿衡·邓云或阿方·唐文）于 1851 年（一说 1861 年）10 月 31 日到达毛里求斯。他初来时即受雇于岛上最大的商行阿西姆公司，并很快成为它的股东。由于他为人正直，熟悉业务，后来就成为公司经理。³³一些华人还率先进入农村和山区，进一步扩大了商业活动范围。在 1850 年，毛里求斯的首府路易港有 586 名华人，有 38 人率先进入农村地区。有一位作者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况：

“过去，或至少在那时的几年前，为数不多的中国人，是流动商贩或者是在最偏僻的地方开铺子的商人，零售些来自中国的商品。如今，他们无论在实力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可以同整个商界较量，既经营零售，也经营小量批发，他们逐步占据了最好的地段，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这时，他们已经操纵了英国、克里奥和法国商人的命运。”

这些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当时华人在商界的实力已十分明显。到 19 世纪末，“700 名中国零售商控制了食品商业，为当时的三十七万一千居民服务。”³⁴到 1901 年，华人有 3515 人，其中 2858 人是商人，占 81.3%。华人商店最早的是南兴号，开办于

1836年;最大的一家是源隆号,创办于1880年。1901年,毛里求斯的85家大商号中,有5家是华人商号。为了维护华人在商界的利益,毛里求斯华人于1908年成立了华商公所,后改名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毛里求斯华人的商业活动也促进了中国与毛里求斯的贸易往来。从李卓凡著作中的统计数字看,毛岛从中国的进口额在1892年为1642卢比,1893年为2472卢比,到1894年猛增至168493卢比,从这一年开始到1907年,毛里求斯与中国及香港的商业往来一直趋于稳定。³⁵

与毛里求斯的华人一样,留尼汪与马达加斯加的华人也经历了从苦力到商人的过程。在早期,他们或是在甘蔗种植园干活,或是在同乡亲友的店铺做伙计。这些华人往往先在雇主的分店再干上一段时间,一边学着做买卖,一边学点简单的当地语言。然后就独立经营。大部分华人先是采取流动贩卖的

表10 毛里求斯从中国和香港进口统计表

(1881- 1910年)

单位:毛里求斯卢比

时期	从中国进口额	从香港进口额
1881- 1890	164717	815208
1891- 1900	1506834	640194
1901- 1910	1550931	59897

资料来源:李卓凡:《西印度洋华侨史》,转引自方积根编:前引书,第114页。

形式。他们将生活必需品送到偏僻的乡下,用以货易货的办法从农民手上换回各种手工制品或蔬菜。这些流动商贩将换回的蔬菜和手工制品再拿到城区的一个中心点摆摊出卖。经过一段时间的流动商贩以后,他们将积蓄的一点钱开一家小商店,选择的地点往往在靠近甘蔗种植园或糖厂,这样能使自己的顾客比较稳定,同时也为当地农业工人解决了实际问题。

在留尼汪,第一批华人商店于1860年开

业,第二年即有了11家华人商店。到1900年已达70家商店。1911年,留尼汪的1160名华人中,有957名经商,占82.5%。³⁶留尼汪华人的商业活动在初期是密切合作的,基本上是在同村乡友的基础上自行组织起来的。这样在资金上可以互相接济,同时也可以省去一些不必要的开支。为了以货易货的方便,他们还建立了商品和产品交换中心点。这种互助合作的关系正是留尼汪华商们在早期商业上取得成功的秘诀。1876年12月,留尼汪4名华商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成立“互救社团”。第二年,这个留尼汪的第一个华人社团正式成立。

马达加斯加华人经商的特点与留尼汪相同:充当中间商。当地的土著居民习惯上不喜欢经商,而欧洲人对当地风俗和语言既不了解,也不愿为了一点微薄的利润而长途跋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小商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当欧洲的外来人和土著人的中间商。”³⁷除此之外,华人还十分善于掌握自己的顾客群。在修筑公路或铁路时,华人的杂货店总是随着工程的进展而移动。流动商贩以菲亚纳南楚阿的麦金最为典型。他以一肩行李,走遍马岛南部,自制腊味运销毛里求斯和留尼汪等地。后来他又随筑路劳工,在工区贩卖各种物品,并在其他地区开设麦金公司分店。在马岛南部,麦金“一肩行李挑出天下来”的事迹在华人中间一直传为美谈。³⁸

到19世纪末,华人的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这引起了法国殖民总督的警惕。他在1899年12月28日写给法国殖民部部长的信函中认为,马岛中国商人和印度商人的势力日益扩展,“确实存在着亚洲人和非洲人以某种方式囤积和垄断这个殖民地几个主要中心区的零售业这样一种趋势,从而对那些现行立法并未给予充分保护的我国同胞十分不利。”他当时刚刚接任马达加斯加殖民地总督,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

“情况表明，现在，我认为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在这个国家不容许某种随时可以接管市场控制的印度人或中国人‘大商行’的出现。亚洲人如果作为零售的中介人，这对欧洲人是有用处的；必须注意，此法令的草案对这一点并未涉及。但是，他们的作用仅限于此。当某种商业局面出现时，如塔马塔夫的陈松(Chan-Soon)³⁹一例；在那里，他们事实上成为城市里最大的商人，从而构成了对我们的威胁。如果我们真正希望将取自殖民地所得利润的那一部分年金留给我国国民的话，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保护我们自己。”⁴⁰

马岛的华人一直是以经商为主，在早期如此，到后来仍然是这样。马达加斯加的华人一方面购进廉价的亚洲商品，将它们抛向市场同法国商人竞争。由于他们的服务对象是普通的工人或农民，提供的货物是盐、糖、肥皂、布匹等，这样销量比较稳定。另一方面，他们又积极收购当地产品，如拉菲亚草、咖啡、胡椒、丁香、华尼拉和海龟，专门销往亚洲。住在城市里的华人多是杂货零售商。在他们的商店里，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从贵重物品到一根香烟，什么都可以买到。华人开设的饭馆也是一样，既有高档的、专供名流贵宾享受的高级餐馆，也有专门为社会下层和苦力服务的小饭馆。⁴¹1906年，华人在塔马塔夫成立南顺会馆。由于法国殖民政府实行严格的控制政策，这一华人社团直到1909年才得以注册成立。后改名为华商总会。

南非的早期华人经历了比其他地区华人更为艰难的历程。一些流放的囚犯刑满后留下来了。早在1726年，开普敦的一名华人开了一家面包作坊，他有几名奴隶帮忙，并派伙计上街叫卖。这种方法引起了其他面包商的不满和抱怨。结果政府发布了一道命令，禁止在街头出售面包。1740年代，约有10名左右的华人在开普敦开餐馆和当小商贩。一位

于1772年抵达开普的海员谈到他们的船还未靠岸，一些黑人和中国人就划着小船向他们叫卖衣服、鲜肉、蔬菜和水果，“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海员渴望得到的。”不过，华人商贩的成功确实引起了荷兰商人的各种抱怨。⁴²

到19世纪，华人自由移民经商的越来越多，有的开店铺，有的开餐馆，有的是流动商贩，有的当伙计。由于华人在生活上省吃俭用，在商务上薄利多销，为人处世又以谦卑著称，生意有蒸蒸日上的趋势。一些白人移民商人开始从各个方面对华人进行诋毁，攻击他们在经商手段上的“不公平竞争”；华人“不管到哪里都要摧毁该地的商业”；他们“竭力吸取任何资财但从不予予什么”。然而，华人为社区特别是为穷人提供的服务却是其他人所取代不了的。1898年约翰内斯堡郊区的贫穷白人向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其中谈到了华人商店对他们的服务：

“我们有时仅有一个先令，在华人商店里，我们可以买上例如3便士面包、3便士奶酪、3便士糖和3便士咖啡。对于我们这些穷人来说，这是很大的帮助。我们还可以购买各种蔬菜、木材；总而言之，任何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在华人商店里买到。如果我们没有钱时，我们还可以向华人赊帐。对于我们这些离家的人来说，如果华人不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将很难维持生活。

如果华人不去约翰内斯堡和福兹堡的市场购买大批的木材、马铃薯和其他产品，然后零售给我们，这些市场主会大生脑筋。如果华人不在这里，我们这些穷人将不得不每次至少用6便士在其他商店购物……。”⁴³

从这封请愿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华人店铺的销售手段十分灵活，各种货物均能满足穷顾客的需要，其特点是薄利多销；第二，他们让穷白人在其商店采取赊帐的办法；第三，华人的业务已经扩展到边远地区，一些穷白人家庭对华人店铺的服

务十分满意，甚至到了依赖的地步。很明显，他们提出请愿书不仅是对华人商店出于感激之情，而且认为华人商店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们希望政府能让华人继续留在他们的社区。在 19 世纪末，约翰内斯堡的华人曾向当局提出过两份请愿书，要求准许他们在当地居留，这两份请愿书均得到了当地白人的签名。1903 年，德兰士瓦的白人提出请愿书，表示华人的服务对当地社区必不可少。⁴⁴

然而，穷白人的呼声在南非这样一个以白人移民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种族歧视是维持白人特权地位的基础，对华人进行限制是一种必然。1909 年，伊丽莎白港的华人杂货店已有 94 家，占压倒优势。当时英国人有 52 家，印度人有 16 家。难怪欧洲商人提出要“对亚洲人加强立法，以“消灭这些恶魔”。华人在商界的优势还体现在饮食行业和洗衣行业。

表 11 南非华人的职业分布 (1905/1906 年)

职业	开普殖民地	德兰士瓦
店员和帮工	729	861
洗衣工	263	39
园丁等	46	69
厨师	28	42
工匠和劳工	21	20
其他行业	15	28
合计	1102	1059

资料来源: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p. 194

华人的经商活动实际上陷入一种两难境地: 如果不求发展, 他们不可能生存下去; 如果求发展, 又必然引起竞争对手的忌妒, 招致新的麻烦。在白人移民商人的压力之下, 开普敦殖民政府于 1904 年 9 月 22 日颁布了 37 号法令, 其中的第 17 节是专门关于向侨

居当地的华人颁发各种营业执照的规定:

“根据此项法令, 任何酒类、采矿、商人、进口商、小贩或其他行业之执照, 不许发给任何未持有登记豁免证书之中国佬; 此等中国佬亦不许对本殖民地上述各项营业执照表现出直接或间接兴趣; 任何未持有登记豁免证书之中国佬不许订立契约以成为矿工、农工、从事其他职业、家庭仆役、洗衣工或任何此项法令之此节所及各项营业执照持有者之帮工。”⁴⁵

这一法令的目的十分清楚, 对日益增多的华人移民特别是华商实行各种限制。同时政府当局还对申请移民的华人进行严格限制。以纳塔尔殖民地为例。据统计, 在 1897 年的前 6 个月, 共有 15 名华人被拒绝入境; 在 1900- 1904 年间, 该殖民地仅接受了 54 名合格的华人, 752 名华人被拒绝入境。⁴⁶ 在英国政府于 1904 年决定为南非金矿大批引进契约华工以后, 南非各殖民地对华人移民的控制更为严厉。为了维护华人的利益, 南非的广府华人于 1898 年成立了维益社。1904 年, 开普殖民地的华人成立了中华总公会。

三 早期华人的社团活动

这一时期华人社区活动的另一个方面是社团活动。社团活动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其一, 华人身居异域, 只有团结一致, 才能克服困难, 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这是社团创立的根本原因; 其二, 华人对祖国的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认同感, 同时又希望天神的护佑, 这就产生了宗教社团的活动, 最突出的是以关帝庙为中心的活动; 其三, 为了保护华人社区的各种利益并互助协调华人之间的关系, 又以故乡地域为基础成立了各种组织; 其四, 随着移民的增加, 各种宗亲社团也开始出现。

早在华人定居的初期, 一些华人社区领袖自觉地出来为华人争取各种应有的权利。1821 年, 毛里求斯华人陆才新请求政府批准

他自费向该岛引进移民，这确立了他后来成为当地华人领袖的基础。1839年，他又代表华人向政府提出申请，请求批准在路易港为华人修建一座关帝庙，并将自己一块面积为1555道斯（法国旧长度单位）的土地捐献出来建造这座庙。⁴⁷ 1829年3月，开普殖民地的一位华人领袖William Assaw向殖民当局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求政府划出一块地以修建华人墓地。这一要求在11年后终于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在1840年5月1日的《好望角报》上，他和其他华人首领发布公告：华人墓地已经由华人集资建立，所有亡故华人均可安葬在此墓地。⁴⁸ 1838年4月，他又两次向政府请愿，要求对从圣赫勒拿群岛转来的华工给予合理的待遇。⁴⁹ 在1907-1911年的反种族歧视运动中，华人领袖梁佐钧、叶远东和霍惠端等人率领华人与当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社团组织的活动更为突出。1851年，毛里求斯的华人已增至1086人。来自广东南海和顺德两地的广府人也明显增加。1859年，南海、顺德华侨成立了南顺会公司。其宗旨是团结乡亲，促进乡谊。1894年，南顺会公司集资修建了会所；是年8月3日，亚方·唐文将南顺会公司改名为南顺会馆，并出任会长，副会长为亚廉·霍坚，第二副会长为陈保；理事有陈玖、关厚、梁深、岑堆等人。南顺会馆于当年在政府注册。1902年，会馆扩大会所，设关帝神坛和祖先神坛。凡是南海、顺德两地在毛里求斯的同胞，不管男女老少、富贵贫贱，均被视为当然会员，受到平等对待。南顺会馆成立后，团结散居在毛岛各地包括山区的乡亲华人，为初临毛岛的华人找寻工作和住所，并为水土不服者或患病者提供免费住宿和饭食。这是毛里求斯华侨的第一个社会组织，其成立为华人提供了很多方便。⁵⁰

清朝咸丰年间，广东客家人相继移民毛里求斯，并成立了嘉应同乡会。同治八年，嘉

应同乡会改名为仁和会馆（后又名仁和会、仁和旅馆、仁和公司），但是没有固定会址。⁵¹ 每年仍以陆才新所建的拉沙鳞关帝庙这一祭祀地作为聚会和议事地点，由会员推举总理和协理来操持会馆事务。由于福建、广府和客家三大集团逐渐形成势力，除了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帮助之外，难免不产生一些矛盾。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陆才新在回国两年后去世。也就在这一年，嘉应同侨照例在拉沙鳞关帝庙祭祀聚会。当时仁和会馆总理王雁宾，协理朱棠、李梗光、王德禄经过商议，提出建立自己的圣帝庙堂的建议。此议一出，仁和会员一致响应。众人即刻捐输，不日即选购场地（今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市西区）动工。

当时，华侨在毛里求斯的人数约为三千多人，客家人约有1500人。1877年，仁和会馆新馆建成，这就是后来的仁和会馆的馆址。当时仁和会馆并无会章，也没有向政府申请注册。其主要目的是祭祀关帝，联络桑梓感情，即“维风化，正人心，举正直，息纠纷，兆祥和之气也。”

1903年，为进一步完善会务，嘉应人陈润生邀集友人，制定了仁和会馆第一部章程，并聘用杨春煦为专职书记，负责管理往来文牒。1904年12月19日，仁和会馆向政府申请注册为正式社团。当时的宗旨是“举办华侨福利，恤孤济贫，排难解纷”。会馆愿意救济贫穷华侨，帮助华侨解决困难和排解纷争。各界华侨如有诉讼纠纷，均不愿意上法庭打官司，双方投诉到仁和会馆就能得到圆满解决。由于仁和会馆在当地华侨中享有崇高威望，故享有“上公司”的美誉。

1905年，陈润生、陈果、朱棠、邓发等人在新小山街（今约瑟伊慰街）19号，向西人购买一座房屋，以作为仁和会馆会员和同仁的下榻之处。同年10月10日，以朱棠为总理，陈果为司库，陈润生、邓发为协理，申请注册仁和旅馆。仁和旅馆在馆内设摊场和

财神爷，重订会章，广招会员，并选举了董事会。仁和旅馆的注册申请被政府批准后，立即被授权管理仁和会馆的产业。这样，仁和会馆和仁和旅馆实为一体。⁵²到20世纪初，虽然毛里求斯的华侨总数增长不多，但“客

籍同侨人数急增”。为了华人的后代不忘祖国文化，仁和旅馆董事会的一些有识之士特地集资租赁当地西人房屋，并从国内请来一位秀才，办起了华文私塾。这是非洲华侨中有组织华文教育的开始。⁵³

表 12 留尼汪华侨早期社团组织一览表

名称	成立日期	宗旨	负责人
华人互助会	1877年6月	华人之间互助互利	
福建会馆	19世纪末	联络福建侨胞乡谊	
广东会馆	约为1896年	联络广东侨胞乡谊	
世昌堂	1896年	联络广东南海、顺德两县陈氏侨胞乡谊	陈绍广 (60年代初)
利涉堂	1897年	联络广东顺德腾冲乡周刘唐侨胞乡谊	周焕多 (60年代初)
梅县公司	1897年	联络广东客籍各姓侨胞乡谊	陈龙长 (60年代初)

资料来源: Edith Wong-Hee-Kam, *La Diaspora Chinoise aux Mascareignes: Le Cas de la Reunion*, pp. 211 - 233; 何静之:《留尼汪岛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5年,页51-52。

留尼汪圣皮埃尔的华人于1877年6月成立了第一个自己的组织“互救社团”。这个组织地处圣约瑟夫街88号,其宗旨是为华人提供各种救助,并向他们提供生产资料。会员每月聚会二三次,互相介绍情况,交换信息。会员每个月交纳一定会费,存放在财务保管员手上。当会员去世时,互救社团必须为他出送葬费,为死者购买墓地。“互救社团”的组织者在致留尼汪总督的一封信中这样陈述他们的目的:

“这个社团的主要目的是用自愿捐助的钱,设一个救助箱,帮助中国人,帮助受到敌对分子打击的同胞。参加者是病人,残废者,穷人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社团给这些不幸者付医药费。社团还承担送葬费。成立一个由主席、副主席、秘书及财务保管员组成的理事会。财务保管员负责委托给他的

基金,他有一本帐簿。……

社团有一个登记本,那上面登记了社团成员,并记载了在经商活动或其它私生活中有过失的成员。除慈善目的外,社团会员还组织联谊会,通过会餐,或举行学宴进行聚会,也有时在社团所在地聚会。经常到特殊的、众所周知的地方去会面,通过召开一些会议,组织一些守法的、正当的娱乐活动,以树立榜样。一句话,形成一个老实、勤恳的中国人的中心,在当局的法律保护下开展互助,这就是社团成员们所追求的目的。⁵⁴

马达加斯加的华人在19世纪末已经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这里的华人来源比较集中,除北部地区少数华侨外,绝大部分均来自广东省的南海、顺德一带。1896年,塔马塔夫的华人成立了华侨协会。1906年,塔马塔夫的华人又成立了南顺会馆。

表 13 南非华人社团组织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社团名称	成立日期	社团领袖
开普敦中华会馆	1902 年以前	Tin Fat (1922)*
南非德兰士瓦中华公会	1903 年	叶远东 (字启佑, Martin Eastern)
东伦敦中华会馆	1905 年以前	Tan Pak Fah**
伊丽莎白港中华会馆	约 1905 年	W. Singson
开普殖民地中华总公会	1905 年	蔡光楼
金伯利中华会馆	1908 年以前	无记录
维益社	1898 年	黎文占 (Lai Mun James)
联卫会	1909 年	何岭 (字端甫, Ho Ling)
纳塔尔中华会馆	1909 年	L. M undon
埃滕赫赫中华会馆	1911 年以前	无记录
嘉应会馆	1895 年	无记录
梅县侨商公会	20 世纪初	无记录
致公堂	19 世纪末	无记录。有人认为与 1896 年杨衢云来南非后建立的兴中会支部同属一组织。

资料来源: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pp. 210- 238; 欧铁:《南非共和国华侨概况》,台北:正中书店,1991年,第64页。

* 文献中最早提及的社团领袖名。

** 他原为新加坡华侨,在东伦敦使用的英文名为 Bernard Brown。

南非的华人也先后成立了各自的同乡社团组织。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非的广东人组织的维益社。维益社的英文名为 Cantonese Club, 成立于 1898 年, 是约翰内斯堡最早的华人组织。值得注意的是, 维益社的会员证上却载明“本社始于民国纪元前三年因抗苛例集合而成”, 这很可能是为注明与联卫会的分裂(1908 年)而特意选定的日期。维益社对所有的广东人开放, 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1903 年, 维益社的会长黎文占(Lai Mun James)解释了这一组织的作用: 向会员提供教育和各种消息, 向会员借阅该组织的各种书籍和杂志, 提供一个开会或聚会娱乐的地方。“我们的想法与欧洲人的想法相似, 我们与欧洲人一样遵守各种法律和规章。”⁵⁵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卓越领导人圣雄甘地在南非作律师期间, 曾积极组织对当局的

种族歧视政策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 并与当地华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经参观过维益社的社址, 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鉴于华人没有住处, 他们就着手成立了广东人俱乐部(即维益社, 译者注)。这里既可作为聚会的场所, 又可作住处, 还可作为图书馆。他们长期租用了一块建造俱乐部所需的地皮, 并在这块地皮上建造了一幢一流的平房。在那套平房里, 人们都十分爱整洁, 注意不将房屋弄脏。从里到外看上去与一个赏心悦目的欧洲人俱乐部不相上下。他们还将俱乐部分为一些单间, 设有绘画室、饭厅、会议室、书记办公室及图书室等标记。每个房间各尽其用, 从不随意挪作他用。与其毗邻的房间均作为住房出租。整个俱乐部既舒适又清洁, 任何访问本镇的中国绅士都可以在此借宿。入会费为每人 5 镑, 至于每年的

认捐，则视会员的职业而不同。俱乐部约有150名成员，每个星期日大家一起聚会，以各种游戏来娱乐消遣。会员们平时也可利用俱乐部的各种设施。⁵⁶虽然从这一组织的英文名来看，维益社似乎专为广府人服务，其实不然。在这一组织分裂之前，它义不容辞地为所有从广东来的华人（包括客家人）服务；从而加强了德兰士瓦华人之间的团结。这一时期在南非的开普敦、德兰士瓦、东伦敦、伊丽莎白港、金伯利、纳塔尔、埃滕哈赫等地均已经成立了华人会馆。这些会馆机构主要靠捐赠、会费和“抽水”⁵⁷来维持。

宗教活动是早期非洲华人社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非洲的华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一样，对关羽十分敬重。大部分华人社区都建有关帝庙，此外，华人的宗教寺庙也都具有多种功能，既是社团（如会馆）的聚会之处，又是祭祀先人的地方，还是同乡宗亲的活动场所。

早在1818年，为祭祀祖先，祈求他们保佑后代平安，华侨首领陆才新决定率领华侨在拉沙麟建造关帝神庙，以作为“社会中心，职业介绍所，住宿地点和庙堂”。⁵⁸在1839年向政府提出申请后，福建人、客家人和广府人合作集资，关帝庙很快开始动工。毛里求斯的第一座华侨神庙，也即非洲华侨的第一座神庙于1842年1月29日举行落成典礼。当时毛里求斯华人只有113人，陆才新以书面通知的形式，“敦请诸位雇用中国人的老板先生，允许提出要求的中国人，去参加寺庙命名仪式，因为此系中国侨民修建的第一座寺庙”。⁵⁹至今，这座关帝庙里还存放着陆才新的画像。

在留尼汪，祭祀关帝和先人的场所和寺庙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已有四处，其中包括世昌堂和利涉堂。⁶⁰在马达加斯加有两座关帝庙。北部的迭戈-苏瓦雷斯华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修建了一座关帝庙，塔马塔夫的另一座关帝庙建成的时间据说更

早。这两座寺庙同时又是当地中华会馆的会址。⁶¹1892年，南非华人首领黎胜和曾为华人建造寺庙一事致函政府，希望政府给予一块地皮，但未获批准。⁶²由于存在着其他一些社会团体可以用来作为宗教祭祀场所，南非的关帝庙似乎不多。大约在19世纪末或本世纪初，金伯利的华人修建了一座关帝庙。⁶³

寺庙都设有管理委员会，其成员由公众推选出来，为社区义务服务。其功能除祭祀外，还有乐施行善，帮助孤寡，聚众集会和其他各种与社区有关的社会活动。非洲华人祭祀的神祇主要有天公、天后圣母、关圣帝君、观世音和土地神（大伯公）。

当时的华人中也有个别皈依了基督教。早在1702年，一位名叫亚伯拉罕·德维夫的华人在开普被接纳入新教教会并接受洗礼。当时的教区委员会声称还有另外两名华人亦将接受洗礼。⁶⁴在南非金矿的契约华工中也有些人皈依了基督教。当时，一些教会获准在矿区散发《圣经》和在圣诞节、复活节和礼拜日到矿区活动。约翰内斯堡的一份报纸曾报道，1905年12月10名中国矿工接受洗礼。在1906年12月也有一些华工接受洗礼。⁶⁵

在19世纪后期，毛里求斯的巴德冽美修女成为在当地有影响的华人基督徒。⁶⁶著名的毛里求斯华人领袖亚方·唐文也于结婚日（1872年6月12日）接受洗礼，并取名路易。成为基督教徒后，亚方·唐文致力于宗教和慈善事业。他曾协助教会说服华人皈依基督教，并为华人修建了一座宗教纪念堂，以答谢圣母对华人所表现的慈爱之情。1899年，路易港流行瘟疫，亚方·唐文特地修建了一所传染病医院，专供患病的华人治疗。

不容忽略的是，早期华侨均是单身来到海外挣钱。由于繁忙之余的生活十分单调，他们中的一些人染上了赌博、抽鸦片和嫖妓的恶习。玩麻将赌博的习惯一直存在于非洲华侨之中，直到二战结束后一些新的社会团体

开始形成时才有所收敛。抽鸦片在契约华工和自由移民中均十分严重，这曾受到清朝政府派驻南非的总领事刘毅的注意。他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致外务部的申呈中指出了德兰士瓦和开普敦的华侨吸食鸦片的情况：“每省约千余人，吃烟人数约居十之三四。”为了在华侨中间开展禁烟活动，他还曾与开普敦殖民政府和德兰士瓦当局接触，以商量对策。⁶⁷

当时，在约翰内斯堡及其近郊地区还有很多被迫为娼的青年女子，这些人大部分是欧洲穷白人的女儿。南非历史学家翁斯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这是伴随着金矿开采而出现的白人工人贫困化的必然结果。根据当时的警署档案资料，这些雏妓经常向约翰内斯堡近郊的华人商贩出卖肉体。这种现象被当时的英文报纸称为“黄祸”。1911年，一位名叫苏姗·布罗德里克的年轻妓女被“卖给”乌雷德多尔普（Vrededorp）地区一位名叫何金（Ho King）的华人作妻子。由于她在此之前已经被多次卖给阿非里卡人（即荷兰人后裔），因而引发了一场轰动一时的“何金夫人案件”。⁶⁸

四 早期华人社区活动的特点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华人社区的经济生活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绝大部分华人都经历了一个从苦力到商人的艰难困苦的过程；第二，早期的华人在创业中团结互助，这是他们商业活动成功的基本保证；第三，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华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特别是商业组织；第四，华人在经商活动中手段灵活，因而十分成功，每每引起当地白人移民的忌妒和无端指责。

对早期华人来说，宗教活动是社区活动的中心。而各地的宗教活动大都是围绕关帝和先人来进行的。为什么各地最早建立的寺庙都是关帝庙呢？这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密

切的关系。关帝又称“关公”、“关圣君”、“关圣帝君”或“关老爷”，华人之所以需要关羽这个形象，有多种原因：第一，他们需要关帝的保佑。华人远渡重洋，到国外谋生，无依无靠，最担心的是客死他乡。一旦他们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定居下来，总是希望平安无事，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在异国他乡，没有亲人的关怀，没有物质的保障，更没有主体文化的心理支持。关帝这位“商家之神”、“公道之神”、“正义之神”就成了他们战胜困难的精神支柱。

第二，在国外谋生，面对各种压迫、歧视和激烈的竞争，华人之间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这种在特殊环境中的相互关系最倚重的是真诚相待，“忠义”二字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羽将军除了是“熊虎将军”和“正义之神”之外，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十分讲究“忠义”的人。这样，关羽的忠义观满足了华人的这种心理需求。关羽的忠义观实际上有三个层次：对国家、对主人、对朋友。身处异域独自谋生的华人不仅有对祖国和故乡的回忆和思念，还需要有亲朋戚友的资助和扶持；而后者靠的是忠诚和信义。

第三，关羽生来疾恶如仇，对一切恶人毫不留情。关帝素来被认为是降伏妖魔的神灵。华人在外生死未卜，成败难料，总是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在遇到大事或需要作出某种重大决定时，华人总喜欢到关帝庙里来预求吉利；在遇到未决之事时，华人来此求神拜佛，希望能逢凶化吉。在平时，华人如有心事或不如意的事，来此烧一柱香，磕磕头，也是抱着免除灾祸的心理，祈求得到关帝的照料。⁶⁹

华人对自己民族宗教信仰的执着也引起了一些具有同情心的欧洲殖民者的注意。毛里求斯总督波普·亨尼西曾于1886年7月20日在殖民地政府立法委员会的辩论发言中谈了自己对华人的看法。他首先指出，按人口比例而言，向国库纳税最多的是华人，犯

罪率最低的是华人，在医疗费用和救济穷人方面花费国家经费最少的也是华人。随后，他针对有人指责华人没有宗教和信仰的说法指出：

“要知道，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凡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是一个对自己的祖先和那些已故的人们怀着固有的崇敬心情的民族；他们认为那些已故的人们同他们怀有共同的信念。这就形成了充满在整个中国侨民中的信仰的基础。走进城内华人经营的小店铺，你会看到些什么呢？在店铺的一端，在晚上你会看到一盏燃着的小油灯——你只有在晚间才会注意到这盏灯，其实他（原译文如此）整天都摆在那里，摆在祭坛面前，这是他们自己的宗教形式。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的信仰形式更完美而指责他们的宗教。总之，他们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他们是世界上最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之一。”⁷⁰

实际上，这种对宗教的执着追求既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具体表现，又是在对自身前途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力图把握自身命运的一种企图和努力。要实现这种把握，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只有借助神灵（而且是中国的神灵）和先人的保佑才能达到。

我们还注意到，非洲华人的早期组织（如会馆、寺庙等），与东南亚等地的早期华人组织一样，是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社团。

第一，这种社团的领袖（首领、董事会或理事会等）是由全体会员一致推选，往往由德高望重的人担任。他们具有一定的财力，又热心为公众办事，同时兼任社区的宗教和世俗事务的领袖，成为华人与当地政府联系沟通的一个桥梁。这样，就为华人提供了一个在心理上可以信赖、在实际生活中可以依赖的组织。对会员而言，它的作用可以说是尽其所能，无所不包。这也为会员提供了一种归属感。

第二，这种组织在领导和管理华人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由于组织的领导者得到会员的认可，会员间如有意见分歧或争执事宜，可到这里来寻求解决的办法，或在不诉诸法律的情况下得到自己所依赖的首领的合理仲裁。由于当时的所在地均有关于华人的歧视政策，如果诉诸法律，不但可能于事无补，还会引发行当局的种种刁难措施。这种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的功能使会员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第三，会员可在一起从事各种宗教活动。在移民的早期，华人处在一个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对很多事情由于文化隔阂而难以理解，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前途不能把握，随人摆布，对各种事情缺乏自信。在这种情况下，祭祀神灵和先人成为十分重要的社会活动。通过这些祭祀活动，会员间更具凝聚力，更加团结。

第四，在新年、中秋和各种喜庆节假日会员们一起聚会庆祝。一方面可以尽情娱乐，从而忘记平日的忧愁和孤独之苦；另一方面，这种聚会可以使会员互相交流，体会到亲朋好友的亲情。

第五，这种组织可以为会员提供各种服务和具体帮助。诸如翻译正式文件、提供身份证明、甚至婚葬大事均可提供帮助；又如帮助会员找工作，为会员提供住宿，资助生活困难的会员等。

更重要的是，早期华人身处异国他乡，遭受种种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只有团结起来，才能体现华人的力量，从而克服困难，共同对付恶劣的生存环境。这是早期海外华人各种社团兴起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北京大学亚非所副教授）

注释：

《华侨经济年鉴，1994年》，台北：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1994年，页922。南非学者叶慧芬也指出了南非学术界存在的这种观点。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xv.

Larry W. Bowman, *Mauritius: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Indian Ocean*,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91, p. 9.

M. Wilson & L. Thompson,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 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p. 66.

“史诺先生介绍非洲华侨历史概况”,《华侨历史学会通讯》,1982年第2期。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pp. 6-9, 57, 33-35.

温广益、蔡仁龙主编:《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页157-163。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pp. 6-9. 但有的学者认为自由华人与自由黑人彼此互不相干。参见詹姆斯·C·阿姆斯特朗:“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的华人(1652—1795)”,转引自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页35。

17 19 李卓凡:《西印度洋华侨史》,转引自方积根编:前引书,页228、173、104。

11 多米尼克·迪朗·让·亨顿:《留尼汪华侨史》,转引自方积根:前引书,页480-481。

还可参见曾繁兴:“寻根:毛里求斯的华人”,《明报月刊》,1980年第1期,页40。

12 13 14 29 李卓凡:《西印度洋华侨史》,转引自方积根编:前引书,页120、122、121、328-329。

15 “陆才新偕首批中国移民到港时发表的声明(见《毛里求斯档案》ZD/1826)”,李卓凡:《西印度洋华侨史》,转引自方积根编:前引书,页307、180。1846年12月8日,7名持有法国护照的华人从留尼汪来到毛里求斯。

16 25 Leon M. S. Slawacki, *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in Madagascar*, Hamden: The Shoe String Press, 1971, p. 43.

18 陈英东:《模里西斯华侨概况》,台北:正中书局,1989年,页32。陈廷植生有二子,长子陈瑞兴,次子陈龙兴,后来在当地华人中均表现突出。

20 Edith Wong-Hee-Kam, *La Diaspora Chinoise aux Mascareignes: Le Cas de la Reunion*, L Hamattan 1996, pp. 71-112; 何静之:《留尼汪华侨志》,台

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5年,页16。

21 国内有学者将其译为阿克温·罗松。

22 关于刘文波的家谱,可参见 Edith Wong-Hee-Kam, *La Diaspora Chinoise aux Mascareignes: Le Cas de la Reunion*, pp. 449-452; 还可参见何静之:《留尼汪岛华侨志》,页75-77。

23 关于马岛最早移民的各种说法,参见 Slawacki, *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in Madagascar*, pp. 43-44.

24 Hubert Deschamps, *Histoire de Madagascar*, Paris: Edition Berger-Levrault, 1961, p. 216.

26 萧次尹:《非洲华侨经济》,台北:海外出版社,1956年,页125-127; 还可参见陈铁魂:《马拉加西共和国华侨概况》,台北:正中书局,1989年,页27。

27 子渔:“东非洲罗连士麦埠华侨一瞥”,《侨务月报》,1936年11-12月合刊号。

28 D. J. Soares-Rebelo, “The Chinese Extraction Group in Mocambique”, Unpublished paper, 1966. 转引自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p. 39.

30 何梓楠:“毛里求斯罗帝利岛华侨史略”,原载于《镜报》(毛里求斯),1981年3-4月刊。转引自方积根编:前引书,页64-68。

31 《外交报》第173期,1907年4月27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32 国内学者一般译为“阿鑫”。“亚贤”似为毛里求斯华人的称呼。引自毛里求斯南顺会馆会长黎永添致李安山1998年10月28日函。

33 译名引自曾繁兴(邓抗升译):“寻根:毛里求斯的华人”,页41。南顺会馆现任会长黎永添先生提供的译名为亚芬·汀均。关于陆才新和亚方·唐文的简历,可参见李卓凡:《西印度洋华侨史》,文件九,转引自方积根编:前引书,页320-325。

34 李卓凡:《西印度洋华侨史》,转引自方积根编:前引书,页128。

35 同上,页132-33,112-113。

36 同上,页480-481。1911年的华人数与上文提到的 Edith Wong-Hee-Kam 的数据有出入。

37 Slawacki, *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in Madagascar*, p. 63.

38 陈铁魂:《马拉加西共和国华侨概况》,页29。

39 此人为塔马塔夫的华商,获准占有16家商店。

40 Slawacki, *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in*

M adagascar, pp. 113- 114

41 李卓凡:《西印度洋华侨史》,转引自方积根编:前引书,页211- 213。

42 43 45 46 49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pp. 7- 8, 83, 66, 44, 15

44 Karen L. Harris, "Closeted Culture: The South Africa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Ethnic Chinese, Manila, November 26- 28, 1998, p. 4

47 70 李卓凡:《西印度洋华侨史》,转引自方积根编:前引书,页321、310。

48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pp. 12, 14

50 曾繁兴(邓抗升译):“寻根:毛里求斯的华人”,页40- 41。关于南顺会馆的资料多为南顺会馆现任会长黎永添先生向本文作者提供。国内的介绍可参见徐植:“毛里求斯南顺会馆简介”,《华声报》,1984年11月11日;林金枝:“毛里求斯的华人社团”,《八桂侨史》,1995年第2期。

51 但在1996年,毛里求斯华人庆祝仁和馆成立125周年。国内一些学者将1904年作为成立日期,这实际上是仁和会馆在政府正式注册的日期而非成立的日期。

52 1929年4月12日召开的会员大会通过决议,批准将二者合并。

53 关于仁和会馆的资料主要来自李济祥:“仁和会馆建立史话”;王惠君:《毛里求斯华人社团研究》节录和黄昆章:“毛里求斯仁和会馆”等文,均载《毛里求斯仁和会馆建馆一百廿五周年纪念特刊》,路易港,1996年11月10日。原刊无页码。

54 多米尼克·迪朗·让·亨顿:《留尼汪华侨史》,转引自方积根编:前引书,页487- 488。

55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

fusion and Concessions, p. 89 维益社的会员证上却载明“本社始于民国纪元前三年因抗苛例集合而成。”这很可能是为注明与联卫会的分裂(1908年)而选定的日期。

56 62 63 65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pp. 90, 86- 87, 54, 123

57 所谓“抽水”,即在假日或节日,其会员或社员多以玩麻将消遣,会馆则从中扣除佣金。参见叶迅:“南非华侨情况忆述”,《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83。

58 曾繁兴(邓抗升译):“寻根:毛里求斯的华人”,页40。

59 李卓凡:《西印度洋华侨史》,转引自方积根编:前引书,页291。

60 Edith Wong- Hee- Kam, *La Diaspora Chinoise aux Mascareignes: le Cas de la Reunion*, p. 222

61 郑向恒:“马拉加西侨情”,《侨务月报》(台北),第166期(1967年6月16日),页25;方积根、李秀华:“马达加斯加华侨的历史与现状”,方积根主编:前引书,页78。

62 阿姆斯特朗:《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的华人(1652—1795)》,转引自方积根编:前引书,页38。

66 曾繁兴(邓抗升译):“寻根:毛里求斯的华人”,页41。

67 “署南非洲总领事刘毅为办理华侨禁烟事致外务部申呈”,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四),中华书局,1985年,页1785。

68 Charles van Onselen,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itwatersrand 1886- 1914*, Vol 1: *New Babylon*, New York: Longman, 1982, pp. 146- 147.

69 楚汉:“非洲华侨华人社会中的关帝庙”,《八桂侨史》,1996年第2期。